“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加速推进联合训练标准化建设

■王文胜

引言 新军事变革浪潮汹涌，军用标准化战略性、全局性、支撑性作用日益凸显。适应军队组织结构日益复杂、专业分工愈加精细、联战联训逐步深入的发展趋势，着眼推动联合训练真正“联得起来、实得起来、落得下去”，迫切需要加速推进联合训练标准化建设，树起标准化、规范化、精准化的实战标杆，努力实现联合训练与联合作战的无缝对接，引领联合训练在标准化轨道上向更高水平发展。

建设一流军队需要一流标准

标准体现生产力，象征软实力。“标”是古代的一种投射武器，“准”是与其相对应的靶心。标准蕴含共同行为过程与结果的一致性，体现人类对标准化的矢志追求。标准化由习俗惯例向经验科学演化，由工业领域向管理领域渗透，提高了生产力，增强了凝聚力。标准化水平体现科技和管理水平，一定程度代表行业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制定生产工艺的技术标准化，能够全面提高产品的适用性和使用效能；规范行为方式的管理标准化，则可以极大增强社会生产生活的有序性。

军用标准化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军事装备标准化，能够极大压缩和优化品种规格，利于组织规模生产获取最大经济效益，便于运输保障，从而赢得作战先机。标准化透过技术形态影响战争形态，通过管理革命引发军事变革。现代军队组织结构向联合方向发展，联合作战战略支援、战役融合、战术协同问题突出，需要基于统一的作战目标进行规划设计，按照统一的流程进行组织指挥，运用统一的话语体系进行沟通协调，采取统一的尺度进行检验评估。如何顺应军用标准化面向多维领域的发展趋势，下好标准化建设的“先手棋”，从根本上实现军用标准功能再造，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回答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联合训练亟待强化标准意识

联合训练是标准化最具创新性的领域。联合训练作为高层次的全域全要素融合性训练，多级异地联动、多方协同交互，需要标准化的软硬件接口和标准化的运维适配机制做保证。

联合训练领导管理体制调整变化，需要通过标准建设，引领联合训练管理与运行机制创新。战区组建，联合训练蓬勃发展，法规建设初见成效，联合训练规定和联合训练纲目进入试行阶段，联合训练组训职能和参训任务基本明确。但是如何更好地履行职能，更好地去完成任务，需要有配套标准，做出明确的目标指引、流程规范和具体工作指导。

联合训练组织形态深化发展，需要通过标准建设，推进联合训练组训施训落实。联合训练参与对象多元，训练空间逐步拓展，联合训练作为结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顺应标准化发展趋势，确立标准化理念，运用标准化方法手段，在标准化的体系框架内有序运行。

联合训练面临一些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标准建设，来化解联合训练中的矛盾冲突。在联合训练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够科学合理的方面。比如，在联合训练管理层面，相对比较粗放，缺少细致的流程规范，每个岗位和人员需要完成的具体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还不够明确；在联合训练保障方面，保障项目指标不够具体，训练需求分析、训练供应保障依据不够充分，等等。联战联训、实战实训要往深里走，愈发需要标准化的引领。

明确战训一体的标准建设指导

联合训练标准体系，源于对未来联合作战的分析研究，适应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联合作战力量体系建设，基于对现实联合训练的科学总结和共同认知，反映联合训练过程和结果特性。

以战领训。牢固树立联为战、练为战理念，把战斗力作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生成提高联合作战能力作为联合训练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确立鲜明实战导向，以联合作战标准为参照，明确联合训练目标，基于目标定起点、明方位、把方向，着力把实战需求转化为联合训练组训施训要求，把联合指挥流程融入联合训练过程，把联合作战行动固化为联合训练内容，把作战能力标准转化为联合训练考评指标。

以联为纲。把握联合训练要素组合、体系运行特点规律，按照联合训练由军种向联合、由要素向集成转变的内在逻辑关系，调整联合视角，找准联合的切入点。遵循联合作战聚优增效制胜机理，以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联合任务部队为主体，抓住联合组训施训关键环节，突出联合指挥、联合行动演练等核心内容，厘清与军种训练的衔接关系，把联合训练标准化的重心定位在联合的层次上。

以实为基。紧贴联合训练创新实践，抓住军事训练体系重塑有利契机，把标准化作为解决现实矛盾、推动联合训练创新的重要发力点和突破口，针对联合训练中的人、事、物等基本要素，突出对领导管理、组织实施、训练保障等关键环节进行系统规范，最大程度增强标准的适用性与实用性。着力促进联合训练走细、走准、走实，有效提升联合训练质量效益和层次水平。

形成科学严密的标准设计思路

联合训练标准体系设计应以联合训练任务为出发点，以提高联合作战能力为落脚点，以联合训练从起始到结束的基本过程为主线，进行统筹规划、系统设计。

夯实基础确立起点。将联合训练质量关口前移，着眼推行联合训练资格认证制度，建立完善军兵种部队参加联合训练的准入机制。明确基本条件和具体要求，规定衔接联合训练与军种专业训练的必训科目，强化联合训练必备基础能力，通过高起点设计，使联合训练作为军事训练的高级阶段，始终保持高效运行，避免年年打基础、补漏洞的低层次循环。

优化流程规范运行。聚焦战区联合训练组织领导职能，把握联合训练组训施训关键环节，加强联合训练筹划设计与督导检查，强调依据作战任务确定训练课题，基于能力需求确定参训兵力，推动作战方案转化为训练演习方案，凝聚抓训治训整体合力。规范联合训练组织实施基本过程、实施步骤，理顺承转协同关系，明确训练内容，细化组训施训形式和方式方法，通过标准化的路径设计，推动联合训练有序运行。

对接战场创设条件。着眼提高联合训练实战化水平，着力推进与信息化建设相协调、与使命任务要求相一致、与武器装备相配套、与联合作战能力生成规律相适应，功能先进、设施完备、对接战场的联合训练环境条件建设。发挥联合训练环境条件建设对创新训练模式、激发训练活力、推动实战化训练落实的助力支撑功能。

精准投入集约保障。适应联合训练保障新特点和新要求，着眼提高联合训练保障集约化水平、提升联合训练保障质量效益，探索构建与联合训练体系相匹配、与供应保障能力相适应的联合训练保障标准体系，有力推动联合训练保障资源的合理配置。

固化成果发挥效能。着眼体现联合训练成效、发挥联合训练能动作用，加强联合训练成果管理，形成联合训练从准入到结束的闭合回路，明确联合训练成果类型，建立联合训练成果梳理、转化、使用规范。细化职能分工，具化评价指标，确保终端落实，以高质量训练成果，牵引战斗力建设、促进联合训练创新发展。

把握辩证统一的标准建设要求

联合训练标准体系，既是训练组织管理部门筹划计划、检查督导、监察考评联合训练的基本规范，也是各级各类受训对象有针对性做好训练准备、精细化组织训练、高标准落实训练的目标牵引和实践遵循。

坚持标准与法规协调统一。标准是对法规的补充，标准与法规相辅相成。联合训练标准化，须以联合作战训练法规为依据，紧紧围绕基本过程，针对联合训练行为和结果进行具化、细化和量化设计，使联合训练标准与联合作战训练法规有机衔接，共同构成保证联合训练有序运行、有效落实的规则依据。

坚持强制性与指导性协调统一。联合训练是联合作战强力牵引下的强制性实践活动，联合训练标准不可避免存在必须执行和落实的一些硬性规定和刚性指标；同时存在一些具有指导意义和起辅助作用的柔性措施和软指标。联合训练标准化不能一概而论或简单僵化处理，要从各类标准的属性特征出发，实施分类建设，既要把硬杠杠立起来，也要把软标准搞科学。

坚持定性与定量协调统一。定性是定量的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盲目的定量，定量能使定性更加科学准确。联合训练标准化，应当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定量指标要尽可能好统计好采集，定性指标要尽可能好评判好把握，努力构建形成以定性为主干、以定量为支撑的联合训练标准体系。

群策集

不断提高治军带兵能力

■徐生平

治军带兵是军队永恒的课题。新的历史条件、新的使命任务和新的官兵成分给治军带兵方式带来一系列挑战，我们必须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根本指导，紧贴时代特点，聚焦备战打仗，强化问题导向，大力弘扬我军管理教育光荣传统，创新思维理念和方式方法，不断提高治军带兵科学化水平。

治法。法善于内，兵强于外。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厉行法治，充分发挥法治对军事效能增长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反映了现代军队建设和军事管理的基本规律。要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坚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引导官兵把法治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构建系统完备、严密高效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军事法治实施体系、军事法治监督体系、军事法治保障体系，坚决维护法规制度权威性，强化法规制度执行力。推动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

治将。国之大事，命在于将。领导干部作为军事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决策者，其素质能力品质作风是否过硬，对军事活动的标准和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官兵生死、战争胜负。强军兴军需要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好干部要选好，就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关键是把“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军队好干部标准和“六个必须”新的时代要求落到实处。好干部要管好，就要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把日常管理和关键时刻管理贯通起来，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好干部要激励好，就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优化干部成长路径，坚持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心理上关怀，激发干部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为党工作，忠实履职尽责。

治兵。人心换人心，玛瑙兑黄金。一切有效的带兵艺术、科学的管理方法，都源于对官兵的尊重和关爱。俗话说，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尽不到的心。管好部队带好兵，就要端正态度，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培养对基层官兵的真感情，时刻把官兵的冷暖挂在心上，做到以心换心，以心暖心。特别是对那些身患疾病、家遭变故、婚恋受挫、承受能力弱、成长进步不顺利的官兵，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耐心细致做好一人一事工作，帮助解决官兵遇到的实际困难，积极创造拴心留人的环境。带兵人能够对兵用心尽心，就一定能换来兵的支持拥护，激发起“可与之赴深溪，可与之共患难”的热血情怀，从而形成“奋一战而胜万战，联万心而作一心”的战斗合力。

治事。管理是科学，领导是艺术。一流的军队，需要一流的军事管理。军事管理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全局性、基础性工作，是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是打赢现代战争的基础性条件。如果管理一团糟，各项要素不能集成发挥作用，是打不了胜仗的，甚至可能是打不了仗的。我们要适应时代变革和战争形态转变的要求，坚持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以世界一流为标准，以效能为核心，以精准为导向，树立信息化、精细化、工程化、标准化、专业化、法治化管理理念，强化战、训、管、育、保“五位一体”的管理理念，加快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加紧构建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新时代军事管理体系，以科学高效管理加快提升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核心军事能力。

治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一支军队的强大，不只是体现在实力上，更体现在精神上、信仰上。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在于有远大的理想、崇高的信仰、优良的作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要强化忠诚于党的军魂意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切实铸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根基。战斗精神是我军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和胜战密码，要传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敢于斗争，敢于亮剑，把战斗精神培育贯穿军事斗争准备全过程。作风关系我军政治本色，关系战斗力建设，关系党和军队形象，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廉洁奉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影响，永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本色。

勇武者胜

■冯 进 陆 锋

挑灯看剑

“勇武一人，为三军雄”，勇士通常与英雄画上等号，是军队的标杆和楷模。“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勇”是中国传统“将德”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克劳塞维茨笔下“武德”的关键要素。无勇敢，不竞争。“勇”是决胜疆场、视死如归的豪迈，是藐视敌人、睥睨困难的气概，是心怀家国、舍我其谁的担当。“齐勇若一，政之道也”。

力强而勇。力生强，强生勇。军人之勇来自于健康强健的体魄、千锤百炼的摔打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战争是集团之间的暴力对抗，军队的强大和勇敢，既取决于每名个体的强大和勇敢，但又并非数量规模的简单相加。“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它来自于爱兵如子、官兵互爱的和谐纯洁内部关系；“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它来自于号令如山、令行禁止的严明军纪；“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它来自于严于实战、高于实战的日常训练。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出战斗力，人人拼力，个个奋勇，“勇”将成为打开胜利之门的战斗力倍增器、放大器。

气壮而勇。气为兵神，勇为兵本。“勇”并不仅仅来自于身体的力量和精良的武器装备，而是来自于内心那一股子“气”，是一种浩然正气。正如法国作家蒙田所说，英勇是一种力量，但不是腿部和臂部的力量，而是心灵和灵魂的力量。“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了解对手、藐视敌人的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的勇；“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临危不惧、化危为机的勇。这些勇气，来自于坚如磐石的信仰，来自于为国为民的情怀，来自于对胜利的追求和对生命的热爱。无论是“决战千里”还是“狭路相逢”，无论是“运筹帷幄”还是“短兵相接”，勇都是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谋定而勇。“勇”与“气”“力”相伴相生，但并非后两者简单的释放。因而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我们崇尚的“勇”，既不是逞强好胜的匹夫之勇，也不是盲目莽撞的血气之勇，而是以理性为内核、以智谋为辅翼、以胜利为驱动的“大勇”。这种“勇”，是有谋之勇，是在作战时机比较成熟、兵力兵器相对集中、技法战法妥善运筹的情况下，针对敌方的致命一击；是有备之勇，是在对作战不确定性有着客观评估，立足最复杂最困难局面，从而树立起必胜信念、做好了牺牲准备；是知怯之勇，“为将当有怯懦时”，此“勇”并非至刚至强，而是能刚能柔，具备足够弹性，能够为着全局和长远利益、为着争取更大胜利，而不逞一时之强、不图一时之快。

勇者无畏，勇者无敌。勇者不仅能战胜外在敌人和客观困难，更能战胜内心的怯懦和恐惧，尽情释放自身的力量和正气。

遵义战役：在战略转移中打好进攻仗

■魏希楠

研史析理

战役简介 扎西会议决定在川黔滇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中央红军二渡赤水，于1935年2月24日至3月1日，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此战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数十挺、子弹10万余发。

讲评析理 遵义战役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上下一扫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和被动的阴霾。这场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

持重待机，根据敌情变化选择作战对象。中央红军自战略转移以来，经常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要想跳出包围圈，保存有生力量，不仅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战略方针，而且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果断地改变行动计划，从而在与敌人的对抗中把握战争主动权。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根据敌情变化选择作战对象，持重待机。1930年2月9日，当滇军安恩溥旅1个团孤军冒进至扎西以南，中央红军即准备“集结全力”伏击敌军，但滇军到达大湾子后未敢再向扎西前进，而是就地构筑工事坚守，与我军对峙。同时，北面川军以其主力由长宁、珙县向西南攻击，且派主力一部入滇追击，如果发起战斗，中央红军很有可能受到川军、滇军两侧夹击，风险很大。据此，中央红军放弃了打击滇军的作战计划，于2月11日开始从扎西地域回师东进。此时国民党军主力追入川南，独留黔军孤悬黔北，整体部署出现了过失。毛泽东建议应避实击虚，迅速摆脱敌人主力的合击，回师东进，重渡赤水河，进到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北部地区，将进攻矛头指向黔敌王家烈部及“中央军”周浑元部，相机占领古蔺城。可是敌情再次发生了变化，在云南军阀龙云的一再催督下，滇军第2旅于14日进抵扎西。为争取迅速渡过赤水河，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再次放弃战斗目标，不再袭击古蔺城，确定了“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的作战计划。这样，中央红军回师黔北，直指桐梓、遵义。

寻求战机，适时开辟战局扭转局势。面对优势国民党军分路推进的正面进攻，红军整体处于战略防御状态。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红军行动稍一迟缓，敌人即蜂拥而来，随时都有被合围的危险。为寻求有利的战机，红军作战必须灵活主动。2月24日中央红军占领桐梓后，国民党援军由遵义、川南、黔西、贵阳地区蜂拥而至。此时，如何开辟战局抓住战机至为重要。但是，红军指挥层关于占领娄山关的作战部署意见并不一致。彭德怀建议“以迅速动作歼灭该敌”，“一三军团应于二十六日拂晓向黑神庙攻击”。而林彪建议红1、3、5、9军团及干部团应于27日同时向娄山关以南之敌猛攻。显然，林彪的建议与军委的想法明显不符，且不说红5、9军团为配合主力行动，在桐梓北部奉命吸引川敌向温水方向，阻止川敌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难以参战。而且，守卫娄山关的敌军不多，敌军主力处在增援途中，虽然我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但是战机稍纵即逝，如果不立即占领娄山关这一重要关隘，对之后的作战行动将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为了抓住战机，实现战略意图，毛泽东与中革军委甚至不惜临阵换帅，将红1、3两军团及干部团的统一指挥由林彪、聂荣臻改变为彭德怀、杨尚昆。红1、3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于2月26日迅速袭占娄山关，击溃黔军两个团，取得了“赤化黔北”关键一仗的胜利。

抓住战机，乘胜追击打援及时扩大战果。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必须抓住有利战机，在敌人溃退慌乱之际和立足未稳之时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尽可能多地歼灭敌人，补充自己。中央红军占领娄山关后，残敌由娄山关逃往遵义，同时由于王家烈在黔北一再告急，蒋介石令薛岳必须确保遵义不失。薛岳命令在乌江以北的吴奇伟率第93、59师迅速增援遵义，令周浑元部向遵义靠拢。占领遵义是中央红军能否继续作战、在黔北生存和休整的关键。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乘溃敌喘息未定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援遵的吴奇伟两个师。2月26日至28日，红1、3军团先后占领遵义新城、老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28日吴奇伟带两个师反攻遵义，激战5个小时被中央红军全线击溃，逃往乌江方向。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下，不顾疲劳，乘胜南下坚决猛追敌人，另派一个团带电台飞速由东向刀把水、老君关地域破坏浮桥，彻底断敌退路。吴奇伟逃过乌江浮桥后，令随从砍断浮桥，阻止红军追过江，跟着吴奇伟南逃的有千把人被搁在江北，被跟追而来的红军所俘。这一歼灭战将遵义战役战果牢牢锁定。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住战机，才能够战胜敌人。“善为将者，必因机以立胜也”，作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家，毛泽东战争指导的高明之处就是在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和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条件下善于捕捉、等待和创造机会，因势利导，敌变我变，应付自如，于劣势中造优势，于常势中造奇势，取得战略主动，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